

【编者按】湖湘近代以来多奋强卓异之才。在我国当今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界，湘籍名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刊自2020年起特设“湖湘学术名家专栏”，以集中展示湖湘学人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具有中国气派、湖湘品格的理论智慧和理论创新。“专栏”不定期推出，与此前的“特稿”交替并置于卷首。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意义重大的新的一年，我们期待通过本专栏的开设，能够得到更多湖湘学术名家的支持，以加快本刊走向国内一流社科名刊的步伐。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

何宗美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四库馆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体大虑精、包举宏纤，是一部超大型的文学批评巨著。其批评对象的庞大性、批评内容的丰富性、批评文类的齐全性、批评体系的系统性，体现了《四库全书总目》无与伦比、不可取代的文学批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籍批评、官学批评和全知批评等文学批评特征，不仅形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独一无二的批评特色，而且构建了《四库全书总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四库全书总目》运用自如的贯通批评、打通批评、通观批评、双向度批评等，又使《四库全书总目》成为18世纪中期中国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在文献、视野、认识、思想、方法等多方面对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以及批评史书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书籍批评；官学批评；全知批评；独特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1672-3104(2020)01-0001-12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足以称得上是一部绝无仅有、特色鲜明的文学批评杰作。但长期以来对它的这一重要性质和价值缺乏应有的评估，由此大大影响了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虽然相关的研究也有一些，笔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研究的离合现象》^[1]一文中做了初步梳理，拙文《〈四库全书总目〉王士禛批评舛误辨证——兼析馆臣提要撰写体例及主观缺失》^[2]、《四库体系中的曲学思想辨证》^[3]、《〈四库全书〉体系中欧阳修“褒贬”问题揭析》^[4]、《〈四库全书总目〉的小品批评——以明代子部提要为中心》^[5]等也做了某些个案或局部的探讨，但涉猎《总目》文学批评的广度和深度仍属有限，研究的推进显然十分必要，也意义重大。

一、《总目》文学批评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性

从文学批评角度看，首先需要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给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总目》的内容并非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关乎文学批评的，这一点与《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原诗》等著作不尽相同，与《闲情偶寄》《文史通义》《艺概》等著作则有类似之处。后一类著作从其整体来看，并非都属文学批评但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文学批评内容，将其作为文学批评著作纳入批评史著作并无歧异，《总目》正是如此。这样，就决定了《总目》文学批评研究的两种情形：一是长期以来对待《总目》并不像《文心雕龙》等纯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提要考辨与学术批评还原研究”(17AZW012)

作者简介：何宗美(1963—)，湖南永兴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果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主要研究方向：明代文学与四库学

粹文学批评著作那样加以重视,其研究相对它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实际内容和地位来说显得还十分薄弱;二是因为《总目》并非纯属文学批评著作,所以若将它看作“中国大文学批评史”而把经、史、子、集总计万余种提要全部当作文学批评来对待,其范围无疑过于宽泛,反之仅局限于《总目》集部之一的“诗文评”,范围则又过于狭窄。可见,《总目》文学批评研究之首务,在于厘清其文学批评的具体范围,确切圈定对此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应有边界。

在经、史、子、集四部中,《总目》文学批评的核心部分是它的集部提要,可以说,集部提要是《总目》文学批评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很少这样来看待,故对它重视不够。具体地说,《总目》集部提要文学批评包括五大内容: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和词曲类,这些内容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大体不出文学范围的。这五个部分所收文献达到3401种,超过《总目》文献总量的1/3,居四部之首。由三千多篇集部提要构成《总目》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具体又分楚辞批评(23部)、别集批评(2528部)、总集批评(563部)、诗文评批评(149部)和词曲批评(138部)^[6],这样就形成了《总目》以“书目提要式”批评为特色的极其宏大而又体系完备的文学批评文本。

虽说集部提要是《总目》文学批评最核心部分,但并非唯一部分,经、史、子各部中也有大量文学批评内容。经部中“诗类”就是《总目》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包括《诗类叙》以及140多篇《诗经》著作提要,以时限言则起于汉、迄于清中期,覆盖了两千年《诗经》批评史,诸如《诗经》阐释之阐释、接受之接受、批评之批评等等,无所不及。虽然,在四库体系中,《诗经》原本不归于今天所说的文学,《诗经》学也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学批评,但因《诗经》的文本性质决定它在今天被作为重要的文学经典,所以“诗类”提要中的《诗经》批评和再批评自然是《总目》文学批评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之一。

史部提要可以纳入文学批评范围的也不少,这主要体现在传记类以及地理类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之中。其数量十分可观,其中传记类达470部之多,地理类相关门目的文献也有300部,合计为770部。尽管它们不能全都算作文学文本,其提要自然也不能尽皆归于文学批评,但与今天所讲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却密切相关——不少文献就是今天我们通常认为

的传记文学和山水游记,只是限于传统目录学的分类在四库体系中被归入史部的传记类和地理类;有的文献虽其整部并非文学内容但其中有一部分是文学内容,像传记类杂录之《闽粤巡视纪略》提要所说“其山水古迹,及前人题咏,间为考证,亦可资博览”^[7](卷五八,820)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此所谓“山水古迹”之“前人题咏”显然就是文学的内容。循着《总目》的此类线索无疑能够发现我们今天所未知的一些文学信息和史料并由此解决不少意想不到的文学问题。

与经、史相比,子部的情况最为复杂。《总目》子部十四类中有三类与文学较为相近,且这三类拥有很大的文献量,其中艺术类161部、杂家类855部、小说家类319部,合计1335部,将近占子书总量2940部的一半。其总体情况与史部传记类、地理类有相同之处,但杂家类更具复杂性。所谓杂家之“杂”,原本就是思想性质而言的,以文学来说则恰因其“杂”而大大增添了通常所讲的情趣性、审美性,也使《总目》此类提要更多带上文学批评的色彩。《总目·杂史类叙》云:“若夫语神怪,供谈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7](卷五一,711)四库馆臣在此明确讲到的归类法即是文学性的著作置于杂家或小说家之中的。再到具体的提要文字,从列入子部杂家之首的《鬻子》始,诸如“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7](卷一七,1564)之说以论为考,其文学批评的性质显而易见。《总目》因清代官学强化正统思想之需要,在四库体系的文献归类问题上采取了退乐归艺^[3]、退史归杂或归小说等做法,如《地理类叙》谓“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7](卷六八,923),事实上也就增加了以上艺术、杂家、小说家三类的文献数量,同时也解决了把偏重于文学的文献归属于文学的问题,即让《山海经》《十洲记》等回到了文学的家园。

综上所述,《总目》文学批评涉及的对象达到了一个巨大的范围,即包括“集”3401部,“经”之诗类146部,“史”之传记、地理类770部,“子”之艺术、杂家、小说家类1335部,总计5652部,超过《总目》收录的10585部^[8]之半。而这只能是大致的情况,因为一方面,此所说5652部著作提要并非都在文学批评的范围内,另一方面,《总目》没有列入这个范围的另外近5000部著作提要也并非都没有文

学批评的内容。后者有两种情况需再作补充：一是经、史、子诸部中还有一些门类夹杂若干文学性文本，其提要也包含了文学批评的内容，此在子部的谱录类、类书类中较为突出，如类书中就有像《诗隽类函》《文苑汇纂》《杜韩集韵》《唐句分韵》等一些文学类书。二是虽非文学文本，但其提要中常常也会有文学批评的成分，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现举以下数例以明之。

(1) 经部之《广易筮》提要：“造语遣词亦多涉明季纤佻之习，盖沿李氏、杨氏之余波，而失之泛滥者也。” [7](卷八, 100)

(2) 经部之《钟评左传》提要：“(钟)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 [7](卷三〇, 393)

(3) 经部之《五经蠡测》提要：“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纒繆，而朱子疾之太甚。于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际，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 [7](卷三三, 431)

(4) 史部之《旧五代史》提要：“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 [7](卷四六, 634)

(5) 史部之《路史》提要：“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曰：‘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词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词人，采摭英华。泌之是书，殆于此类。” [7](卷五〇, 693)

(6) 史部之《太平寰宇记》提要：“故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 [7](卷六八, 925)

(7) 子部之《胡子衡齐》提要：“其文章则纵横恢诡，颇近子书，与他家语录稍异。盖直少攻古文词，年二十余始变而讲学。故颇能修饰章句，无诸家语录舛陋粗鄙之状云。” [7](卷九六, 1260)

(8) 子部之《论语逸编》提要：“至于承蜩、弄丸，乃《庄子》寓言，而执为实事。赤虹、黄玉尤讖纬诞语，而信为古书。” [7](卷九六, 1267)

(9) 子部之《管子榷》提要：“其《七法篇》评云：‘是注意之作，可为文式。后之分段者，神弛气懈，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来文家反学其病，文之坏由韩、苏以来’云云，亦可称敢于大言矣。” [7](卷一〇一, 1318)

在此所举诸例并非随意为之，考虑到的是各自所

具有的代表性。《总目》中非文学文本的文学批评往往体现在上述各例所反映的种种情况——关乎某一时代表整体文风批评的，如《广易筮》提要对晚明文风的评价及其所持态度；在某一作家的非文学文本中涉及其文学文本之批评的，如《钟评左传》对钟惺《诗归》的评价；《总目》经部专有“五经总义”一类，其著作提要包含《诗经》批评在内，如《五经蠡测》提要；著作关涉到某一著名文学家，故亦不乏联系到文学方面的因素来对非文学文本的解读，如《旧五代史》提要从欧阳修“文章”的角度来阐释其史家风格；对非文学文本之文学性及其价值、影响的评价，如《路史》提要不仅直接论及该著文风，还引用《文心雕龙》来显示其文学价值；至于有的著作本身含有一定文学内容，如《太平寰宇记》提要注意到该著收录“列朝人物”(包含文学人物在内)，并录“题咏古迹”，特别是开启“方志必列人物、艺人”之体例，这无疑是对其文学性质及价值的评价；还有一些思想家本身也是文学家，《总目》在其思想著作的提要中亦通常对其人其著的文学因素加以重视，如《胡子衡齐》提要比较与一般语录“舛陋粗鄙”之不同恰在于其文风“纵横恢诡”，作者的文学功夫成就了其著作的不同凡响；有时还涉及对文学文体的批评态度，如《论语逸编》提要对寓言、神话(“讖纬诞语”包含神话内容)的看法，以为不能“执为实事”和“信为古书”；此外，一些很经典的文学批评论断也被《总目》引用并加以讨论，如《管子榷》提要举其书中“文之坏由韩、苏以来”的说法且以“敢于大言”以斥之。

诸如此类在《总目》中显然不限于此9例而已，且这里的9个例子实际上恰代表9种情况，循着这些情况加以梳理，则无疑能让散见于《总目》这部宏大著作中极为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得以集中地显山露水，其结果至少有如此一些意义——从批评内容来说，前文所粗略梳理的《总目》文学批评5600多种涉及对象之外有了进一步丰富和补充；从批评文献来说，在一些就其整体并非文学批评的文献中发现文学批评的次文献，由此大大拓展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从批评对象来说，可以获得关于作家批评、文体批评、文风批评、断代文学史批评等许许多多重要的信息和论断。

《总目》堪为一部体大虑精、包举宏纤的文学批评巨著，是一个超大型的批评文本。其批评对象的无比庞大、批评内容的极其丰富，构成了《总目》无与

伦比、不可取代的文学批评价值的重要方面。以今天的文学分类来说,《总目》文学批评涉及诗、文、词、曲、小说以及文学理论,等等,其中诗文集达到2528部,总集562部,《诗经》著作146部,《楚辞》著作23部,词曲138部,小说319部,诗文评149部。这还不包括经部之“五经总义”“乐类”,史部之“杂史”“传记”“地理”,子部之“艺术”“谱录”“杂家”“类书”等诸类别中所涉文学类文献和文学性批评。可以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著作像《总目》一样包举内容如此宏大而丰富。而且,其无比庞大的批评对象、极其丰富的批评内容在《总目》中并非以松散杂乱的状态出现,而是形成了较为完备且又架构巨大的体系。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的贡献》认为《总目》“对于中国古代诗人作家的批评(主要是集部提要),总结起来,其实便是一部颇具规模的古代文学史纲”,“把‘诗文评’类提要对于中国古代主要的文学批评著作的批评总结起来,其实便是我国一部简要的文学批评史纲”^[9]。作者富有卓识的见解是着眼于《总目》“诗文评研究史的贡献”来说的,从整部《总目》来看,其文学批评的“贡献”则远超出于此。所说“总结起来”的工作,目前为止尚未真正展开。《总目》文学批评从纵、横两个维度充分彰显了它的宏大性、丰富性和系统性。横即类别史,纵即断代史、通史。横的维度,如别集提要,2500余篇即构成宏大、丰富的诗文批评。其他类别也如此,《诗经》批评、《楚辞》批评、总集批评、词曲批评、小说批评、诗文评批评皆自成体系。纵的维度,《总目》各类文献叙录皆以朝代先后为序,从先秦到清中期,形成了包含经、史、子、集四大类在内的大批评史,而这个大批评史又由各个历史时期的断代批评史所组成。其文学批评包括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和清前中期从诗、文到词、曲、小说、诗文评等各文类的批评,并形成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史。只是对某一时期来说,它的文学批评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门类的著作提要之中。如明代诗文批评主要见于《总目》别集,千余篇明人别集提要构成了一部宏大的明代诗文批评史。明代《诗经》批评史、《楚辞》批评史、词曲批评史、诗文评批评史、小说批评史,则分别由《总目》经部诗类提要、集部楚辞类、词曲类提要、诗文评类提要和子部小说家类提要所构成。这样《总目》就包含了明代诗、文、词、

曲、小说、诗文评以及《诗经》《楚辞》批评,成为一部批评对象最为庞大、批评视野最为广泛的意义特别的明代文学批评著作。以此而论,今天仍然没有一种明代文学批评著作能超出《总目》。只是《总目》的批评为“目录提要式”,在形式上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著作而已。

二、《总目》文学批评的鲜明特征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总目》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所体现出的文学批评特征上——从批评对象来说,它是书籍批评,即主要不是诗文的单篇批评,对它的研究可以弥补今天的文学批评主要以具体作品批评为主的不足;从批评立场来说,它是官学批评,即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学批评,是非纯文学批评的批评,对它研究可以给今天以个体批评家为主体的文学批评以启示;从批评者视野来说,它是全知批评,与通常仅就某一作家、作品或仅就文学论文学的文学批评不同,对它的研究可以给今天的文学批评者本身以助益和借鉴。

(一) 书籍批评

《总目》文学批评的特征首先表现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鲁迅所说的“书籍之批评”^[10]。他当时或许只是随意一提而已,目前为止也无人引起过注意,但这一提法隐含一个足以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批评视角或方式,即把书籍而不是把某一作品作为批评对象。在西方理论界,书籍批评倒是并不新奇,李欧梵《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曾谈到威尔逊、特里林、斯坦纳、韦勒克等批评名家“所作的批评(criticism)并不仅仅是对某经典名著详加分析而已,而是把一本本书、一个个作家评论一番,逐渐形成一己的观点和主题”,并认为“这是一种西方人文批评的传统”^[11]。“把一本本书、一个个作家评论一番”的批评,其实就类似于《总目》的“书籍之批评”。我们现今主要流行以作品分析为主的文学批评,“书籍之批评”作为曾经有过的“批评的传统”则几近失传,这是传统目录学衰落的结果。而按章太炎《文学略说》“著作之文”“独行之文”之区分^[12],理应就有“著作之文”批评和“独行之文”批评的不同。“独行之文”批评即通常所谓作品批评,“著作之文”批评即书籍批评。抓住书籍批评这个批评特征,对《总目》研究具有还

其本原的作用。书籍批评与作品批评并行不悖，打通文学批评中微观视野与宏观视野的界分，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来说亦当开拓一片星空。

书籍批评首先是对《总目》批评性质的准确判断和定位。与单篇作品批评不同，书籍批评的对象是整部著作，甚至是汇集众多著作于一体的大部头丛书，《总目》总集中不少即如此。这种批评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它是一种大批评，或者说是宏观批评，尽管偶尔涉及某些单篇作品的微观批评，但也是从属于宏观批评的。这种大批评性质的文学批评，以宏观性、整体性、综合性为特点，与单篇作品批评的微观性、片断性和个别性不同，其批评指向是作家及其著作整体，其意义在于有益于形成一个作家思想和创作的总体判断，以此为基调对其具体作品的评价提供指导作用，等于说它是一个作家批评总纲，有了这个总纲个别作品的批评就有了大体方向。何谓《总目》之书籍批评呢？在此举几例以示之，如评张以宁《翠屏集》：“其文神锋隼利，稍乏浑涵深厚之气。其诗五言古体意境清逸，七言古体亦迥警……近体皆清新，间有涉于纤仄者。”^[7](卷一六九, 2264)]评张羽《静居集》：“今观其集，律诗意取俊逸，诚多失之平熟。五言古体低昂婉转，殊有浏亮之作，亦不尽如彝尊所云。至于歌行，笔力雄放，音节谐畅，足为一时之豪，以之接迹青丘，先驱北郭，卢前王后之间，亦未必遽作蜂腰矣。”^[7](卷一六九, 2273-2274)]评屠隆《白榆集》：“隆为人放诞风流，文章亦才士之绮语……文尤语多藻绘，而漫无持择，盖沿王、李之涂饰，而又兼涉三袁之纤佻也。”^[7](卷一七九, 2497)]其共同特点恰如李欧梵所说是“把一本本书、一个个作家评论一番”，而非就某一作品的评价。因每则提要都类似于一部书或一个作家的批评总纲，这样对研究张以宁、张羽、屠隆便给予了重要指导价值。就整部《总目》来说，所拥有的这种总纲不计其数，研究者通过这无穷多的总纲获得深入一个作家或一部著作内在世界的便捷途径。那么，由《总目》所构成的作家及著作世界，就成为有一个有无限理解和阐释空间的批评世界。这是非书籍批评的批评著作难以企及的。

作为书籍批评的《总目》还体现了批评与文献、批评史与文献史的统一。这是《总目》作为书目提要式文学批评所体现的独特性。一般的批评著作并不能兼备系统的文献与批评于一体，批评史不能同时展现完备的文献史。这一点，《总目》则是得天独厚的。

它的书目部分即为文献，提要部分即为批评。如集部之“别集类”收录书目2 500余部，展现了我国古代诗文集的庞大文献，而两千多篇提要则构成诗文批评的丰富内容。由此无论哪一门类都形成了批评史与文献史的统一。可以说，《诗经》书目提要，既构成一部《诗经》文献史，也构成一部《诗经》批评史。以此类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书目提要，无疑也是《楚辞》文献史与批评史、别集文献史与批评史、总集文献史与批评史、诗文评文献史与批评史、词曲文献史与批评史的融合。这样，《总目》之体系就同时拥有批评对象的文献史与批评史两大系统，二者彼此呼应，相互支配，形成了一种意义独特的批评文本。它的意义是，一方面为每一门类建构了庞大有序的批评谱系，另一方面也为每一门类建构了庞大有序的文献谱系。其中，批评谱系为文献谱系提供价值评判和定性定类依据，文献谱系则为批评谱系厘清边界、梳理对象、充当基石。这虽是“目录提要式”批评的必然产物，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一种极具特色又意义重大的批评模式。

当然，《总目》书籍批评还包含了一些可以称之为书籍学的重要内容，包括书籍分类、属性、体例、编纂、刻刊、版本等等，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书籍学之集其大成者，通过深入研究则能对传统书籍文化的传承大有裨益。

(二) 官学批评

《总目》文学批评的第二个特征是官学批评，而且是我国古代最完备、最系统同时对文学介入最深的官学批评^⑧。可以说，《总目》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着官学气息。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官学对真正意义的文学批评存在严重干扰，对文学发展中的进步因素肆意歪曲、抹杀的现象十分突出。这贯穿于《四库全书》编纂的全过程，也深刻地体现在《总目》的字里行间。此仅举典型一例：《总目》对李贽及晚明性灵思潮的批评，突出体现了官学以正统自居而滥用政治文化暴力到了何等偏激的程度——“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7](卷一七八, 2463)]，这种借“名教”之名对异端中的进步思想一概棒杀的做法，使得晚明一系列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颇有建树的人物包括徐渭、焦竑、汤显祖、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等尽遭贬斥、抹杀。官学批评的危害性必须通过对《总目》的深入研究加

以肃清并引以为戒。

作为一种性质特殊的批评方式,《总目》官学批评也应该被客观地对待。首先从批评现象来说,区别于批评家个体的文学批评,《总目》官学批评给批评本身增添了另一种途径,其方法、模式、特征等皆不同于一般批评家所进行的文学批评,由此对批评本身来说是一种丰富。其次,《总目》官学批评的全局性、正统性、严肃性,虽然与文学批评通常所要求的自由性、个性化相冲突,但其视野的宏阔、严肃的姿态、中正的观念,一方面作为一种批评存在自有其一定合理性,另一方面对私人化批评也有值得借鉴或作为补充的地方,对私人化批评的随意性是一种有益的规避与克服。还有一点是特别不能忽视的,即与一般文学批评多为单向度批评不同,《总目》官学批评突出体现为一种双向度批评。所谓双向度,表现为《总目》的官学批评是一种“褒贬批评”,或者说“严褒贬”是《总目》官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特点。乾隆帝谕曰:“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7](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6)“严褒贬”“衡是非”是《总目》官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与文学批评的审美宗旨完全不同。为此担任《四库全书》总裁官的于敏中还为《总目》的褒贬批评制定了具体细则,即:“提要宜加覈实,其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13]这里的“拟刊者”即后来收入《四库全书荟要》者,是官学立场认为纯正的经典之作;“拟抄者”即收入《四库全书》中除《荟要》之外者,是被认为夹杂问题的书籍;“存目者”即见于《总目》之“存目”者,则主要是“问题书籍”。三类之外还有禁毁书,那便是官学认为危害极大、不可传播的“坏书”或“劣书”了。因“有褒无贬”的“拟刊者”仅四百多种,而《总目》收入的书则达万种以上,可见《总目》“褒贬”批评的总体倾向是以“贬”为主,即以批判为主。这表明清代官学对中国古代著述评价的基本态度是批判性的,同时也体现官学批评“政治审核”的严厉性,而《总目》双向度批评的官学本质由此可见。

需要注意的是,《总目》文学批评的官学性带有政治与学术的两面性,其官学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性,而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官学除其政治使命之外,也有学术使命在。一方面,在政治使命的驱动下,《总目》必然服务于清代政治,其思想体现高度的正统性、保守性甚至反动性,从而限制、禁锢或

抹杀非正统思想和自由个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倾向是贯穿于《总目》全书之始终的,自然也突出地反映在它的文学批评之中。作为其文学批评总纲的《集部总叙》^[7](卷一四八卷首,1971),官学色彩就十分浓厚:“总集之作……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其论总集而归咎“声气攀援”;“而兰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篋中集》则附登乃弟……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论倡和、诗社而以“标榜”相责;“诗文评之作……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其论“诗文评”而大谈“门户构争”,而“门户”之起又以“讲学”“论文”为两大祸端,并加“讲学”以“祸延宗社”之罪名。原因在于这几个方面都易于促使文化力量集结、个人文化权力以及自由思想彰显等。显然,《总目》的总集观、结社观、诗文评观、讲学观、论文观等都严重存在官学的政治偏见,是官学左右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突出体现。而从另一方面看,在学术使命的驱动下,《总目》又一定程度体现其“垂范方来”“嘉惠后学”^[7](卷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1)的性质,所以作为官学批评的“严褒贬”“衡是非”也并非全是政治意图的简单干预,还包括文化角度的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比如对“剽剽”“抄撮”“割裂”“杜撰”“穿凿”“窜改”“抵牾”“支离”“丛碎”“晦涩”“险僻”“诘屈”“浅俗”“庸肤”“鄙陋”“猥琐”“拘腐”等问题的揭示、批判则大多情况是基于学术或审美因素的,并不能以官学批评一概否定。总之,《总目》的官学批评有其政治与学术、思想与文化、致用与审美相并存的特点,此乃其复杂性所在。

(三) 全知批评

《总目》文学批评最为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批评者的身份特征。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从《总目》批评者的特殊性来关注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一无二性。馆臣作为《总目》批评者有三个特点:一是钦定性,即朝廷任命的而非自由批评者;二是群体性,即由正副总裁官、总纂官、纂修官等组成的群体而非个人批评者;三是专门性,即集十余年之力以“厘正典籍”“辨厥妍媸”^[7](卷首《凡例》·33,31)为职事而非临时或随意的批评者。这就在批评者资质及其所专注的时间、体现的功力、具有的视野等方面构成了《总目》批评

者的独特专长，古今中外，罕有其比。总纂官纪昀白云：“余于癸巳受诏校秘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14]（卷八《诗义补义序》，156）又说：“诗日变而日新。余校定《四库》所见不下数千家，其体已无所不备。”^[14]（卷九《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序》，第一册，207）其说还可佐之以他人之言，如阮元称纪昀：“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15]陈鹤亦谓：“其在翰林校理《四库全书》七万余卷。《提要》一书，详述古今学术源流、文章体裁异同分合之故，皆经公论次方著于录。”^[16]虽不能像有的研究者把《总目》看作“纯属纪氏一家之言”^[17]，但不可否认的是，纪昀作为一位批评者有两点完全是超乎常人的，那便是他的视野和功力。借用叙事学的一种说法，称其为一位“全知全能”^[18]的批评者不无道理。如果将批评者与批评对象之间也像叙事学关于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19]那样分为三种情状：一是批评者视野大于批评对象，二是批评者视野等于批评对象，三是批评者视野小于批评对象。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的《总目》批评即是批评者视野超大于批评对象的批评，所以说是“全知全能”的批评。《总目》文学批评视野宏大、左右逢源的特征即全局性、自由性通过主批评者纪昀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诗歌批评，随处可见纪昀所具有的“数千家”诗视野的优势。得出“诗日变而日新”的诗史观纲领，正是他在“数千家”诗视野中总结出的真知灼见。认为诗歌“日变日新”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因是“拟议变化”，如说“诗格日新，宗派日别……然自汉、魏以至今日，其源流正变、胜负得失，虽相竞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概，不过拟议、变化之两途”^[14]（卷九《鹤街诗稿序》，第一册，206），包含了纪昀论诗两个紧密相关的要点，一个是“日新日别”、另一是“拟议变化”，而《总目》诗歌批评恰是以这两个要点为基石的。有了此一基石，又借助“数千家”诗的视野，《总目》论诗便充分体现既包举宏纤、高屋建瓴又游刃有余、触类旁通的特点来。拿明诗批评来说，因诗家云涌、诗派林立、诗论纷扰、诗史繁复，故论明诗之难为历来共知。但观《总目》之论明诗，则完全有如数家珍、挥洒自如之感，即凡论一集皆非仅就某集某人之评价，而是纵论一代之诗史、诗风、诗派甚至跨越明代而追溯汉、唐、宋、元之源流，且每能融会贯通，出以精要之论，诸如陶安《陶学士集》、刘崧《槎翁诗集》、童冀《尚纲斋集》、高启《大全集》《凫藻集》、林鸿《鸣盛集》、孙蕡《西庵集》、陶宗仪《南

村诗集》、董纪《西郊笑端集》、史谨《独醉亭集》、杨士奇《东里全集》、杨荣《杨文敏集》、倪谦《倪文僖集》、韩雍《襄毅文集》、岳正《类博稿》、李东阳《怀麓堂集》、林俊《见素文集》、李梦阳《空同集》、张羽《东田遗稿》、何景明《大复集》、王慎中《遵岩集》、李攀龙《沧溟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袁宏道《袁中郎集》等提要概莫能外。试举《怀麓堂集》提要言之：“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懦。虚懦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平心而论，何、李如齐桓、晋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气终存。东阳如衰周弱鲁，力不足御强横，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遗风。殚后来雄伟奇杰之才，终不能挤而废之，亦有由矣。”^[7]（卷一七〇，2299）此堪称一篇明代诗文史概要，也是一篇明代诗文论简纲。一百余字短文足见评论者对明代诗文格局的把握完全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同时对“拟议变化”“日变日新”的论诗宗旨也运用得十分自如、到位。论明如此，其他亦不例外。如《集千家注杜诗》提要：“辰翁评所见至浅，其标举尖新字句，殆于竟陵之先声。”^[7]（卷一四九，1996）独孤及《毗陵集》提要：“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7]（卷一五〇，2003）钱起《钱仲文集》提要：“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7]（卷一五〇，2004）这些例子都是以一代诗史甚至历代诗史的眼光看一家诗风之形成，但凡作出某一微观或个案的批评判断，往往都源于对宏观或全局的贯通。达到这种批评境界，离不开馆臣作为批评者的特殊阅读功力。纪昀所谓“校定《四库》所见”诗家“不下数千家”，“其体已无所不备”，正是那种全知视野、无碍境地让他论诗成竹在胸、顺手拈来。

综上所述，书籍批评、官学批评和全知批评，不仅形成了《总目》独一无二的批评特色，而且构建了《总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三、《总目》文学批评的特殊价值

一部批评史，通常是批评史与书写史的共同结果。从批评史到《批评史》，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转化行为，那就是“书写”。批评史不断书写的过程，往往

是人们对批评史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总目》文学批评认识的不断获得,同样需要通过《批评史》的不断书写来实现。而借鉴《总目》文学批评的资源,纳入《总目》文学批评的内容,吸收《总目》文学批评的思想、方法、体系等,对《批评史》书写也大有助益。

我们可以从文献、视野、认识、思想、方法等多重角度来考察《总目》之于文学批评研究以及《批评史》书写的多重意义。其中文献意义、视野意义已不难从上文看出。文献方面再略举一例:现今如撰《诗经》批评史,最系统的文献仍属《总目》“诗类”书目提要。近年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至元代卷、明代卷)主要是基于清初朱彝尊《经义考》“诗”部分的增补,二书体例一致,都是相关材料的汇录,不属《诗经》文学批评性质的文献。以欧阳修《毛诗本义》来说,《经义考》汇录张燿《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及楼钥语^[20],《历代诗经著述考》则在此基础上补录林光朝《与赵著作子直书》、朱熹《朱子语类》、钱曾《读书敏求记》等材料,也包括《总目》提要^[21],末附按语亦未及评论。《总目》则不同,它不是抄录材料,而是作了一篇较系统的综述和评论,且有两个要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指出欧阳修为诗经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破毛、郑旧说而开后之学者“务立新奇”之先声;二是总结解诗可归于两大系统,即“文士之说诗”的“求意”诗经学、“讲学者之说诗”的“绳理”诗经学^{[7](卷一五《毛诗本义》提要,190)}。《总目》具有高度的批评史价值,特别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文献宝库,且经过清代一流实学大师的整理、鉴别、评价,其文献既有体系性又具高质量,为《批评史》书写奠定了深厚的文献基础。视野方面也再略作补充。视野与文献相关,文献之大,意味着视野之广。如人物视野,《总目》一万多种文献涉及的作者就达近万(有一人多著、多人著的情况),汇集的人物传记、人物品评最为齐备,对研究古代士人或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线索。再如版本视野,一万多种文献至少涉及一万多种甚至几万种版本,这又为研究书籍生成、传播和影响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总之,《总目》因其视野之宏大为文学批评开拓了无限多和无限广的研究路径,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除文献、视野外,还有几个方面则详述如下:

(一) 认识:真知灼见,可资探究

《总目》汇集了方方面面、许许多多的真知灼见,

只是因书目提要的体例特点,其认识亮点散见于书中以较为隐蔽的状态存在。一旦将其认识上的真知灼见系统地整理出来,就会有无穷多的启发触亮我们的研究之眼、点燃我们的思想之光,有的还可提炼成专题加以探讨,使一些向来并不被关注的问题得以揭析。当然,《总目》的认识亮点首先需要我们去发现。在此有必要以若干实例略作说明:《经部总叙》小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7](卷一卷首,1)},这里指出王学末派“以狂禅解经”的问题,揭示了一种很重要的“解经”现象。研究中晚明思想史特别是经学、儒学和禅学,如对这种现象细作梳理、深加探讨,无疑能取得有益的突破。再有,《古今律历考》提要讲到一个重要道理:“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故其术愈阐愈精,后来居上。”^{[7](卷一〇六,1390)}原本指的是天文算法的“推步之学”,但对思想、文学阐释学来说也是至理名言,甚至还可以上升到作为认识人类思想何以能前后相续、何以需要不断进步这一本质问题的伟大洞见,充满了真理般的智慧。至于直接涉及文学的,如谓“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7](卷一四九《九家集注杜诗》提要,1995)}、“自宋人倡诗史之说……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7](卷一四九《杜诗撮》提要,1997)}、“诗之雅俗在格韵,不在体裁。苟词旨凡近,即四言亦属庸音;苟兴象深微,即七字亦成高调”^{[7](卷一八〇《黄元龙诗集》提要,2504)}、“词人之作散文,犹道学之作韵语”^{[7](卷一七三《梅村集》提要,2341)}、“明季纵游江湖间,其诗颇多哀厉之音”^{[7](卷一八〇《益斋存稿》提要,2505)}、“譬诸明代之诗,(陈)维崧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吴)绮追步于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琢,纯为宋格,则三袁、钟、谭之流亚”^{[7](卷一七三《陈检讨四六》提要,2346)}、“国朝之有士禛,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而尊之者必跻诸古人之上,激而反唇,异论遂渐生焉。此传其说者之过,非士禛之过也”^{[7](卷一七三《精华录》提要,2343)}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上升到现象、特征、规律层面的独特看法,无论是具体关乎某些作家还是关乎某一时代、某些问题,都值得以此为专门的话题深加研究,对我们现有一些研究或将带来耳目一新的认识。

(二) 思想:平正典则,旨在建构

《总目》有其明确的思想,诸如《凡例》中所言“敦崇风教,厘正典籍”“阐圣学明王

道”^[7](卷首《凡例》·33-34)，其批评思想即受此支配，并以官学性为突出特点。《总目》批评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最主要有“平正”思想、“典型”思想和“建构”思想等。所谓“平正”，是指《总目》追求立论的平和公正、不偏不倚，以尽可能达到稳实可信的批评效果。诸如“平心而论”“平心论义”“平心之论”“平心解斗之论”等，是《总目》的惯用批评话语。这些字眼里反映了《总目》的批评心理，不可轻视。可以说，鲁迅先生批判的“乱骂和乱捧”的“批评家的错处”^[22]，早在《总目》中就有了自觉的规避。今天倡导的批评家应当“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准确的批评”^[23]，《总目》的批评思想中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尽管官学立场在有些问题的认识偏颇使《总目》的“平正”成了“官学的平正”，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不“平”不“正”的问题也严重存在，但作为一种强调批评“平正”的思想观念则是值得肯定的。再说“典型”，或称“典则”，它是指《总目》视野中思想、文化、文学的最高范式或基本规则。对“典型”意义的强调和重视，是《总目》“正变思想”与“正统思想”在批评运用中的集中反映。《总目》持“正变观”和“正统观”看文学，其“正变”之“正”、“正统”之“正”就是“典型”。唐诗批评，《总目》以“开、宝浑厚之气”为“正”，以“大历以还”为“变”，但“变”之中值得肯定的则是那不变的东西，即“变”中之“正”。纪昀评价钱起作品“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而所谓“风人之旨”“前辈典型”，近即指具有“浑厚之气”的开元、天宝即盛唐文学，远则指《诗经》及其传统^[7](卷一五〇《钱仲文集》提要，2004)。“正”中观“变”，“变”中求“正”，由此在“正变”中求“正统”，并通过“正”即“典型”起到诠释什么是文学范本、需要创造什么文学的垂范效用，这些观念和做法被贯穿在《总目》对我国古代文学的总体把握和系统梳理之中。无论是《总目》的“平正”批评思想，还有它的“典型”批评思想，最终都体现出《总目》文学批评中的“建构”思想。《总目》的文学批评不以客观还原历史本原为目的，既主要不是知识性的，也不是文献性的，而是还原与建构的统一。这与一般书目提要完全不同，与今天一些批评史更侧重于呈现知识或观点的原本内容也不一样。它的“建构”意图和“建构”特征十分突出。“《总目》的书目体系统一并受制于它的思想观念体系，其中官学是其灵魂”^[24]，由此形成了它的

“建构性”。而其“建构”，就其性质而言是官学立场下正统文学的“建构”。《总目》的体现手段主要包括：第一，以著录、存目为区分的正本、副本两个系统的创制；第二，以褒、贬为区分的两种批评趣向的运用；第三，以盛、衰为区分的两种文学“世运”的构造。其中第三种尤其对“盛世”文学奉为“正统”加以推崇，并尽可能构建某些称之为“盛世”的“典型”，与此同时则把“衰世”文学斥为“末流”“异端”加以批判或抹杀，以此将“世运观”与“正变观”“正统观”统一起来，达到文学与政治、文学批评与政治意图一体化，从而建立《总目》构架下的文学史系统。用今天的话来说，“正统文学与异端文学的区隔”在《总目》体系中的体现，对“中央集权权力又是如何渗透到文学的内容中去”^[25]的问题，恰是做了一个最好的回答。

(三) 方法：褒贬向度，溯源贯通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曾有学者论及“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评”“选本”“摘句”等，其中“推源溯流”亦涉及《总目》^[26]。作为数以万计书籍的批评之著，《总目》的批评经验无与伦比。其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批评方法无疑需要专门研究才能得到系统总结，特别是其“书目提要式”批评本身就形成了批评方法的鲜明特色。《总目》批评方法之典型者，择要言之有褒贬批评、辨证批评、溯源批评、贯通批评等。

褒贬批评前已略及之。《总目》最广泛运用这种批评方法，且有显有隐，有则有度。显，就是明言褒贬，如论范仲淹：“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7](卷一五二《文正集》提要，2041)论李贽：“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7](卷一七八《李温陵集》提要，2463)这是明褒明贬，毫不含糊。隐，则为无声之褒贬。如收入《四库全书荟要》者虽无褒评亦皆为褒，斥为禁毁书之列者虽无贬言实乃为贬。著录书、存目书、禁毁书的归类是《总目》褒贬之一手段，收录序列之区分又是《总目》褒贬之另一手段。如宋濂集列于明太祖集之后而为明文人别集之首，吴伟业集列于清御制文集之后而为清文人别集之第一家，即是“褒”之体现；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文集一皆归于存目，则属“贬”之无疑。这种情况还有更为隐约不显的，如欧阳修被置于宋人别集第62位，没有排在宋

人别集的首卷,在第二卷也被放到了居中位置,而首卷和该卷居其前者比他年小二十甚至四十岁者大有人在,说明其序列并非简单依年齿而定。结合《宋艺圃集》提要痛批“编次后先”“最为颠倒”,“如以苏轼、苏辙列张咏、余靖、范仲淹、司马光前,陈与义、吕本中^④、曾几列蔡襄、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前,秦观列赵抃、苏颂前,杨万里列杨蟠、米芾、王令、唐庚前,叶采、严粲列蔡京、章惇前,林景熙、谢翱列陆游前者,指不胜屈”^{[7](卷一八九,2646)},又结合《总目》对欧阳修不乏贬义评价,可知这完全是寓褒贬于序列的做法^[4]。有则有度,是指《总目》的褒贬法度分明,有分寸感——极褒不贬、褒而不贬、褒而微贬、褒贬参半、贬而微褒、有贬无褒、极贬痛斥以及此褒彼贬、褒贬互映、隐显互用等等,情态万端,异常复杂。在《总目》中,褒贬批评是实现清代官学的价值判断、审美取舍的重要手段,是思想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春秋笔法”。

其余如“辨证批评”者,多引述某一观点,并提出“未允”“未可”“非是”之类看法,然后辨证而释其疑,如王祜《王忠文公集》提要辨“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精密而气弱,非笃论也”^{[7](卷一六九,2264)}。这种方法在《总目》频繁运用,是由该著“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7](卷首《凡例》,31)}的思想宗旨决定的,但也体现了很强的问题意识,这是《总目》难能可贵之处。“溯源批评”,也是《总目》基本批评方法,其例随处可见。但凡用到“滥觞”“先声”“导源”“由来”“渊源”“所自”“蹈袭”“遗意”“后劲”“末派”“末流”等等,如宋薛嵎《云泉诗》提要谓“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7](卷一六五,2185)},明张含《禺山文集》提要谓“明人别有雕镂堆砌一派,含其先声欤”^{[7](卷一七六,2418)},明董纪《西郊笑端集》提要谓“往往得元、白、张、王遗意”^{[7](卷一六九,2277)}等,一皆如是。这为文学流变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线索。“贯通批评”,一是经、史、子、集的批评贯通,二是历朝历代的批评贯通,三是对一作家多种著述的批评贯通。这既是由于《总目》批评非限于某类、某时、某著而是贯穿历代、无所不包的宏大批评,也是由于作为批评者的四库馆臣视野宏大、学识渊博,由此自然形成了足以打通界分、融会通达的批评优势。贯通批评尤具借鉴意义,能有效开拓今天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思路。以明代小品为例,《总目》的批评视

野打通经、史、子、集各部,突破仅以文体为范围而上升到一种文化品趣作观照,揭示了四部各类著述出现“小品化”的倾向,如说“明季说诗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7](卷一五《毛诗陆疏广要》提要,189)},即关注到儒家经典阐释在晚明的小品化特征;谓《广月令》“好取新奇,转成浅陋……亦不出明季小品习径也”^{[7](卷六七,922)},则指史部著述深受小品浸染。解经小品和史家小品的出现令人瞩目,至于子、集的情况则更为突出,这是明代文化的特殊现象。以这种视野来全面梳理明代的小品文化和小品文风,无疑将大大推进明代小品研究之突破^[5]。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它是堪与《文心雕龙》相提并论的文学批评杰作。与《文心雕龙》一样,《总目》体大虑精,但比《文心雕龙》的批评对象更宏大,批评视域更宽广。其批评范围包括经、史、子、集四大体系,可以说是在四大体系的场域中进行其文学批评,故其批评触类旁通、无所不及。这样,反而使它没有将纯文学批评与它背后的巨大思想文化场景隔绝起来,更具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式”文学批评的典范性,亦或说它所进行的批评才是真正带有传统性质的“中国”文学的批评。与《文心雕龙》兼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两大板块不同,《总目》主要偏重于文学批评。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文学长河中批评对象最为庞大、批评文类最为齐全、批评体系最为系统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特别是《总目》积累了丰富的文学批评经验,形成了运用自如的批评方式和批评思想,获得了取之不尽的批评成果,包括文学通史与作家、书籍、作品个案的贯通批评,文学批评与非文学的经、史、子诸部批评的打通批评,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学术史、社会生态史、士人风尚史大视野下的通观批评,以及带有鲜明官学色彩的双向度批评,等等。

总之,《总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卓绝地位。《总目》作为18世纪中期中国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

注释:

- ① 此据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附录之“《四库全书总目》文献收录统计表”,下文亦有用到柳著统计数据之处,不再一一注出。
- ② 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附录“《四库全书总目》文献收录统计表”则为10255部,确切数字需要有待精确统计。

- ③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特色，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何宗美、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年版），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 3 期）等有所讨论，可参看。
- ④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中”字原作“仲”字，今改。

参考文献：

- [1]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研究的离合现象——兼谈《批评史》的当代书写问题[J]. 贵州文史丛刊, 2019(4): 46-57.
HE Zongmei. The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phenomena on the critical research of literature of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Also on the modern writing issue of Critical History[J]. Guizhou Culture and History, 2019(4): 46-57.
- [2]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王士禛批评舛误辨证——兼析馆臣提要撰写体例及主观缺失[J]. 文学遗产, 2015(6): 171-182.
HE Zongmei. Dialectic analysis of mistakes of Wang Shizhen's criticism at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stylistic rules and subjective absence of the library secretary's abstract [J]. Literary Heritage, 2015(6): 171-182.
- [3] 何宗美. 四库体系中的曲学思想辨证[J]. 文学遗产, 2018(2): 154-163.
HE Zongmei. Dialectical thoughts on Qu Xue in the four treasures system[J]. Literary Heritage, 2018(2): 154-163.
- [4] 何宗美.《四库全书》体系中欧阳修“褒贬”问题揭析[J]. 文学遗产, 2019(1): 59-72.
HE Zongmei. An analysis of Ouyang Xiu's "appreciation and depreciation" in the system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J]. Literary Heritage, 2019(1): 59-72.
- [5]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品批评——以明代子部提要为中心[J]. 文学评论, 2019(5): 164-173.
HE Zongmei. Criticism of sketch in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An inquiry into Zi division of the ming dynasty[J]. Literary Review, 2019(5): 164-173.
- [6] 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3: 311.
LIU Yan. Research on the Ji division of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M].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2013: 311.
- [7] 纪昀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JI Yun. The authorized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M]. Bei 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8] 李学勤.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LI Xueqin. The authorized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Preface[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9] 吴承学. 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的贡献[J]. 文学评论, 1998(6): 131-140.
WU Chengxu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to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poetics review[J]. Literary Review, 1998(6): 131-140.
- [10] 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80.
XU Shouchang. Impression of my late friend Lu Xun [M].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1: 80.
- [11] 勒内·韦勒克. 批评的诸种概念[M]. 王馨钵, 杨德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
Wellek, Rene. Concepts of criticism [M]. Trans. Wang Xinbo, YANG Deyou.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2015: 2.
- [12] 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235.
ZHANG Taiyan. Lectures on Chinese studies [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5.
- [13] 于敏中. 于文襄公手札[C]//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 22 辑.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6: 75.
YU Minzhong. Uncle Yu Wenxiang's letter[C]// SHEN Yunlong.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Series. Vol. 22. Taipei: Taiwan Wenhai Press, 1966: 75.
- [14] 纪昀. 纪晓岚文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JI Yun. Collected works of Ji Xiaolan[M].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5.
- [15] 阮元. 纪文达公遗集序[M]//纪昀. 纪晓岚文集: 第三册, 附录.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727.
RUAN Yuan. Preface to official Ji Wenda's posthumous collection[M]// JI Yun. Appendix to Collected Works of Ji Xiaolan, Volume III.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5: 727.
- [16] 陈鹤. 纪文达公遗集序[M]//纪昀. 纪晓岚文集: 第三册, 附录.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729.
CHEN He. Preface to official Ji Wenda's posthumous collection[M]// JI Yun. Appendix to Collected Works of Ji Xiaolan, Volume III.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5: 729.
- [17] 郭伯恭. 四库全书总纂修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216.
GUO Bogong.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compilation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1992: 216.
- [18]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 等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262.
Wellek,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M].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5: 262.
- [19]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13.
SHEN Dan. Narratology and the stylistics of fiction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3-2.
- [20] 朱彝尊. 经义考·补正·校记: 第二册[M]. 翁方纲补正、罗

- 振玉校记. 北京: 中国书店, 2009: 739-740.
- Zhu Yizun, Correction and Proofreading of *Jing Yi Kao: Volume II* [M]. Corrected by Weng Fanggang, and Proofread by Luo Zhenyu. Beijing: China Bookstore, 2009: 739-740
- [21] 刘毓庆. 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至元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33-139.
- LIU Yuqing.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Pre-Qin to Yuan Dynasty)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133-139.
- [22] 鲁迅. 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85.
- LU Xun. Snappy newspaper articles: Harsh remarks and exaltatio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5 [M].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585.
- [23] 王先霏, 胡亚敏. 文学批评导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74.
- WANG Xianzheng, HU Yamin. A guide to literary criticism[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274.
- [24] 何宗美. 《四库全书总目》: 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7(3): 1-9.
- HE Zongmei.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the official system, features and defects: Taking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M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7(3): 1-9.
- [25] 朱国华. 文学与权力: 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17.
- ZHU Guohua. Literature and power: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egitimacy of literatur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7.
- [26] 张伯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07, 108, 150, 165.
- ZHANG Bowei.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107, 108, 150, 165.

Literary Criticism of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HE Zong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literary critical masterpiece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abbreviated hereafter as *Catalogue*) is a supersized critical text with huge volume, profound thoughts, inclusive movements and sublime texture. The bulkiness of the objects of its criticism, the richness of the contents of its criticism,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literary genres of its criticism,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critical system, all manifest its unparalleled and irreplaceable value in literary criticism. Such literary critical traits as book reviews, official criticisms and omniscient criticisms of *Catalogue* constitute not only its unique critical value, but also its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Moreover, its flexible penetrating criticism, thorough and overall criticism, comprehensive criticism, and two-way criticism render *Catalogue* a monu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mid 18th century. It represents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at time, exerting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references, horizon, knowledge, thoughts, methodology and so on.

Key Words: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es*; literary criticism; book review; official criticism; omniscient criticism; unique value

[编辑: 谭晓萍]